

「集中力量幹大事：救總」之研究—— 以發展型國家理論探討

The Study of The Free China Relief Association (FCRA) – An Approach of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蕭吉男¹

目次

壹、前言

貳、「發展型國家」途徑概念及運用

- 一、「發展型國家」途徑概念發展與侷限
- 二、「發展型國家」途徑之運用——台灣黨國體制

參、「發展型國家」集中力量幹大事：「救總」之成立

- 一、黨國威權統治時期「救總」之角色定位
- 二、威權統治時期之「救總」任務特權
 - (一) 救亡圖存的發展意志
 - (二) 反共復國任務的自主性
 - (三) 鑲嵌自主性的組織機關
 - (四) 統合式管理、計畫及干預

肆、結論與展望

- 一、國民黨係「救總」往昔的美麗與當下的哀愁
- 二、民主台灣是未來「救總」發揮所長最佳的舞台

參考文獻

1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博士生。

摘要

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由共產黨贏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國民黨政權遷抵台灣。台灣，成了蔣介石政權設定的反共復興基地，實施以黨領政、黨國一體的威權統治。在此政治體制下，筆者爰引以探討戰後東亞發展模式的「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 作為研究途徑，投射在台灣個別歷史脈絡中，以「救亡圖存的發展意志」、「反共復國任務的自主性」、「鑲嵌自主性的組織機關」，以及「統合式管理、計畫及干預」等四項指標，歸因分析釋疑何以在戒嚴時期，「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 得以成立為合法人民團體？業務範疇何以如此多元化並可橫跨黨政軍？以及會內人事任聘，財政收支與黨政機關留下互為表裡、存在因果路徑的軌跡。

人類的思想乃是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該思想著落的時代環境背景，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影響或制約，反映著思想建構者特定的歷史處境或社會位置。故本研究報告動機在於持平地、客觀地，透過「發展型國」理論相關指標，辯證「救總」在過往兩蔣黨國體制中之人事安排、財務狀況與業務工作等之正當性、合法性。並依據研究結果，期能達致為「救總」之未來定位、轉型走向提出具體、階段性建議之研究目的。

關鍵字：救總、發展型國家、黨國體制、威權統治

壹、前言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Free China Relief Association, 簡稱：簡稱：救總, FCRA) 於一九五〇年四月(民 39), 應蔣介石前總統號召, 以救助大陸淪陷地區災難同胞目的而成立。彼時為戒嚴時期, 人民集會結社自由遭凍結的時空下成立, 該機關業務相當繁重; 經參閱《救總實錄》、《救總六十: 中華救助總會成立 60 周年專輯》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簡稱: 黨產會) 的調查報告、聽證紀錄等文獻資料顯示, 工作內容包括: 救濟大陸災胞、援救境外難民與反共義士、支援西藏抗暴運動、空投空飄物資與文宣品等, 任務可謂繁重且神聖。

筆者於此爰引以探討戰後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為主的「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 理論作為研究「救總」途徑, 係源於二次戰後國民黨蔣氏政權遷移至台澎金馬後, 這種「發展型國家」係在高度反共恐共的氛圍下, 對社會進行動員與號召,² 具有「集中力量幹大事」的能力及特色; 該理論咸認須奠基於威權體制下, 且國家身處在美蘇冷戰對峙博弈中, 加上殖民與內戰遺緒之特殊歷史情境框架, 多具備以下特點: (一) 救亡圖存的發展意志; (二) 反共復國任務的自主性; (三) 鑲嵌自主(embedded autonomy) 的組織機關; (四) 統合式管理、計畫及干預。期能藉由是類指標以檢證, 歸因分析釋疑何以在戒嚴時期「救總」得以成立為合法人民團體? 業務範疇何以如此多元化並可橫跨黨政軍? 以及會內人事任聘, 財政收支與黨政機關留下互為表裡、存在因果路徑軌跡。

2 瞿宛文,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緣起: 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 一版, 2017 年, 頁 440。

觀諸近代台灣處境；二次戰後日本國戰敗，五十年殖民政權撤離。不久又逢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遭共產黨取代，致中華民國政府舉遷來台固著至今，意即日本國、蔣介石兩個政權一進一出交替治理台澎金馬。「誰統治？」是社會研究中的老問題，因為它涉及人類社會中資源擁有的不平等，以及資源使用的差異所導致的權力不均。在所有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和結構裡，國家機器是最具影響力的，是最主要的權力容器（power container）；權力研究必然涉及權力擁有者之間，以及他們與國家機器的關係。³

慘敗後轉進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痛定思痛著手進行社會、黨務等各項工作改造，強化國民黨在「權力容器」內之中央與地方、黨內外、國內外之恩給庇護建構權，及制裁競爭者、汰除不利己者之最終核判權，這一系列的改造重組過程，確立了蔣氏政權可一黨獨大、以黨領政、永久執政的黨國威權體制。

台灣在黨國威權體制運作下，經濟發展成績逐漸展露頭角，同時期尚有新加坡、南韓、香港等合稱「亞洲四小龍」，此東亞經濟奇蹟模式引起關注，也著實地挑戰了「依賴理論」之核心與邊陲、不平等關係與剝削過程的束縛。台灣、南韓的發展歷程，復以一九八二年 Chalmers Johnson 對日本通產省機關如何促進工業發展的研究，讓國家機關的角色功能受到重視，美國社會科學界興起一股「把國家找回來」（bring the state back in）呼聲，開啟了「發展型國家」的論述。⁴

3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一版，巨流，1996年，頁13。

4 龐建國，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時代意義，一版，韋伯，2012年，頁76。

人類的思想乃是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該思想著落的時代環境背景，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影響或制約，反映著思想建構者特定的歷史處境或社會位置。⁵ 故本研究報告動機在於持平地、客觀地，透過「發展型國」理論相關指標，辯證「救總」在過往兩蔣黨國體制中之人事安排、財務狀況與業務工作等之正當性、合法性。並依據研究結果，期能達致為「救總」之未來定位、轉型走向提出具體、階段性建議之研究目的。

貳、「發展型國家」途徑概念及運用

「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理論者認為，東亞之所以具備成長發展條件，係源於西方國家殖民統治時，殖民母國在獲取自身利益時，同時也把成功經驗複製傳承予殖民地。惟以「國家中心」學說 (state-centered theory) 論點觀之，是直接挑戰傳統西方古典價值觀，另主張：透過個案研究便可發現，不僅在東亞，同時在多數發展中國家裡，政府都扮演著推動發展甚至塑造市場的關鍵性角色。⁶

一切的經驗科學，不論是物理科學、生物科學或行為科學，都是在尋求有關經驗世界的知識。尋求過程的原始起點，即是對經驗世界的觀察。根據觀察，對某些事物共同具有的特性加以抽象而形成概念。再根據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產生命題或陳述。一套具有邏輯推演性及經驗印證性的命題或陳述即是科學的理論。⁷

5 龐建國，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時代意義，一版，韋伯，2012年，頁21。

6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二版，五南圖書，2013年，頁30-31。

7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六版，三民，2003年，頁30。

概念不僅在比較、分類、量化及理論化上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新概念的創造過程及代表一門學科的成長與發展，就整個政治研究的進步而言，概念或者概念系統至少具備兩大作用：第一，提供累積性的工具；第二，則是提供新的研究方向。⁸故本章節筆者將先就「發展型國家」途徑作基礎理論文獻回顧，根據戰後東亞發展路徑實證性經驗概念，再以此理論途徑辯證「救總」在黨國體中的功能定位。

一、「發展型國家」途徑概念發展與侷限

東亞在戰後的發展顯然與其他後進國家不同，主要爭議的焦點在於國家的角色。傾向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論述，大多認為一九六〇年代之後，經濟之所以快速發展繫於市場因素而非國家。反之，「發展型國家」論者認為國家從中扮演重要甚至關鍵主導角色。

近代「發展型國家」研究，代表性論述濫觴於 Chalmers Johnson 的一九八二年名著：《MITA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係以日本「通產省」(MITA) 的功能角色作用所創造的工業發展奇蹟為研究個案。日本此一個案模式，被認為亦適用在台灣、南韓、新加坡及香港等東亞發展中國家、地區之戰後經濟發展研究，直至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遭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批判而趨於沒落。從發展社會學的學術史來說，經過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世界體系理論 (the world-system theory) 到國家中心

8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六版，三民，2003 年，頁 50。

論 (the state-centric theory) ，發展型國家論強調國家角色，可算是國家中心論的一部分。發展型國家的主要觀點並非首創，在經濟發展史、發展社會學、比較政治，都有許多類似的概念，如後進工業國家、強國家機關、官僚威權體制等。⁹

「發展型國家」相關研究者中，Chalmers Johnson 是以日本國「通產省」個案建立模型；其研究橫跨日本軍國主義和戰後民主時代 (1925-1975) 。Johnson 認為國家性質之決定，係基於被選定的優先政策目標而確立；「發展型國家」就是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位置的國家。但是想要發展並不等於得以發展，還須具備一系列社會政治條件，發展目的才有機會實現。其臚列的必要條件有四：一、優秀的官僚：制度上有精簡且具有管理長才的機關和官員；二、國家自主性：結構上授與政府機關主動和有效執行的權柄；三、干預市場：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要依照市場法則；四、經濟計畫機關：經濟計畫設有「通產省」這樣的內閣級專責機關。這四項指標可以說是「發展型國家」的原型。¹⁰

Amsden H. Alice 的一九八九年名著：《Asia's Next Giant : South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把南韓當成是後進工業化 (late industrialization) 國家的典範，其除了也擁有 Johnson 所說的國家四大特徵，另細微差異在：國家以補貼方式積極介入市場，有意以扭曲價格以刺激經濟活動。南韓的產業政策具有強烈的選擇性，政府透過干預把那些投資引向戰略性部門，為達成這一目標，政府有意地扭曲價格，例如：給予長期性

9 鄭為元，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1999 年，頁 4-5。

10 鄭為元，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1999 年，頁 9-10。

的信貸優惠利率，但也對受補貼的企業嚴格地鞭策 (discipline) 要求。也就是，政府對企業既有政策支持輔導但也伴隨著監督約束考核。¹¹

另把發展理論發揮到極致者係 Robert Wade 於一九九〇年之著作：《Governing the Market :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s Industrialization》即統御市場論，認為這是國家選擇適當的策略性工業，加以扶持，國家扮演統御者的角色，若缺乏政府的干預就很難辦到。¹² 就像古典自由主義者也承認政府得以不同程度地存在般，「發展型國家」理論也沒有完全否定自由市場的重要性，重點放在資本累積的重要性，兩個視角的差別就在於如何理解政府和市場在東亞國家內的組合方式。

一九八七年的 Deyo, Frederic C. 主編的論文集《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目的直指就是透過探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東亞經濟發展理出更合適的解釋；此著作集結數位國家主義派學者研究論文，係「發展型國家」理論重要成果之一。到了廿世紀九〇年代初，理論已基本成型。而 Ziya Onis 對 Alice H. Amsden《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Frederic C. Dey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Robert Wade《Governing the

11 趙自勇，發展型國家理論研究的進展和反思，當代亞太，第 11 期，2005 年，頁 6。

12 鄭為元，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1999 年，頁 12-13。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等四本著作，發表了評論性文章：〈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可謂對此「發展型國家」理論作一個總結。

歸納 Johnson 之後的學者的補充解釋大抵有兩大類，一是為「發展型國家」干預市場提出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论依據，如 Wade (1990)。二是提出「發展型國家」干預市場之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條件、實行產業政策。但政治與官僚等菁英必須是具經濟發展傾向的，而不是為了自利而搾取，如 Evans (1995)¹³ 和 Weiss (1998)¹⁴。然而第二類的闡釋卻隱含著理論上的缺陷：「發展型國家」有如精神分裂，一方面需要自主於社會的政治力量之外，另一方面又需要民間經濟行為者的配合，而可能影響其自主性，從而導致產業政策的變質（由發展傾向變為分配傾向）和失敗（沒有能力鞭策經濟行為者）。雖然這個「發展型國家」理論上的缺失在 Johnson 舉出的日本歷史研究中顯示，國家和企業間在長達約百年的競爭中，於二次大戰後取得平衡，產生了國家壓不過，而是處於一種平衡的合作狀態。但這種平衡畢竟會因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歷史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狀況。¹⁵

綜上，對於「發展型國家」的討論，必須放到個別國家歷史脈絡中才能看到國家自主性的源起；而其後來的經濟發展，也與

13 Evans, Peter B.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4 Weiss, Linda.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5 林文斌，臺灣「發展型國家」國家的調適或轉型？，政治科學從論，第 37 期，2008 年，頁 100。

國際政治經濟有密切相關。首先，「發展型國家」在政治上大多是威權主義國家，而基本上是內戰的產物。由於內戰之故，這些國家將生存和國家安全視為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例如：南韓面對的是北韓，而我國也須面對甫成立的中共政權武力解放台灣的威脅，另香港就位處中國沿海，而新加坡面對的則是馬來西亞。戰爭的威脅一直是亞洲四小龍國家生存必須面對的重大議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同樣是具有自主性的國家，東亞與其他第三世界地區的官僚，並非掠奪性而是發展性的問題。因此經濟的自主和對內政治秩序的維持，成為首要考慮。而在政治逐漸穩定之後，經濟發展逐漸代替國防安全成為維持正當性的基礎，追趕西方的成長主義，成為國家自主的民族主義在政策上的表現。¹⁶

「發展型國家」途徑危機發生於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這次危機由泰國泰銖開始，蔓延至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南韓等國。危機後，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乃起因於東亞國家政府過度介入經濟發展，衍生官商勾結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代表市場資訊不透明、金融自由化泛濫缺乏監督、信債過度膨脹等負面因素，總的來說，就是高度發展與尋租貪污舞弊幾乎是劃上等號。但這樣的批判確無法解釋為何過往是成功的典範，同時也間接地承認東亞國家之所以能於戰後發展，與國家干預唇齒相依、相輔相成。

二、「發展型國家」途徑之運用—台灣黨國體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美國、蘇聯冷戰隨即在一九五〇年代始爆發，東亞新興國家皆陸續捲入參與其中，致這些國家

16 王振寰，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與轉型，臺灣社會學刊，第 31 期，2003 年，頁 16。

多帶來一連串的威權統治者。這些新興國家實施高壓統治當下，普遍透過黨國行政組織與企業控制國家生產，造就了東亞之日本、台灣、新加坡、南韓於一九六〇年代起的經濟奇蹟，後起之秀包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成績亦不惶多讓，世界銀行一九九三年的「東亞奇蹟：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研究報即以「表現優異的亞洲經濟體」(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cs · HPAWs) 稱之¹⁷。

東亞資本主義有三大特色：出口導向性工業化、發展型國家模式與密切的政商關係。其中，「發展型國家」被認為是介於市場經濟模式與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間的一種混合型態。相關討論多認為，國家決策與執行力具有以下三種特色，並環環相扣：(一) 國家具有高度「自主性」，決策者能排除私人利益干擾，從國家政策所需作規畫並落實考核。(二) 國家機器習以壓制手段，或站在制高點角色統合以統合方式管理、引導社會組織。(三) 國家內部機構與不同行動者角色皆須聽令於引導性機構協調。¹⁸ 值得注意的是，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歷史背景是冷戰時期，由於美國極力保衛日本、南韓與台灣，故給予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並協助其從事土地改革、經濟政策擬定。當政權穩定後，美國片面地開放市場以吸收這些東亞國家加工出口品的結果。此類國家為維持或創造國家自主性，以便不受社會團體壓力的影響，政治上通常是威權主義政治體制。¹⁹

17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 V. Chibber,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4 (2002), pp951-989.

19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二版，五南圖書，2013年，頁121。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蔣介石對台北黨、政、軍要員說：「我們的戰鬥仍未結束，戰爭將長期持續著，我們會對戰敗（大陸內戰）負起責任，同樣的，我也將負起新而神聖的光復大陸的責任，我絕不會離開這塊土地，當我完成任務時將與諸位回到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所謂的「光復大陸」、「反攻大陸」從一開始即是一個被注入很強烈感情的神聖目標。在大陸有各種戰爭經驗、出身「革命軍人」的蔣介石與陳誠（行政院院長），分佔第一及第二號人物，軍事費用佔政府預算的八成（五〇年代），將戒嚴令永久化的政權，雖未採軍政型態，卻有很強的軍事色彩。²⁰

蔣介石將大陸戰敗歸咎於黨員的腐敗、組織的鬆弛和軍隊士氣低落、軍閥化。從這種反省而導出的黨「改造」，範圍不僅限於黨組織的整頓與改革，更要克服黨內派閥，貫徹領導者的指導（「領袖獨裁」），以黨對國家機構進行一元化的指導，重建政權為政黨國家。其精神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黨是政府與軍隊的靈魂，也是導演、引擎，政府和軍隊不過是演員、車輛。但是國民黨為了表示自己的正當性更甚於中國共產黨政權，也為了得到美國的支持，承認自己是屬於「自由陣營」，不得不讓「黨退到背後」，留下「民主憲政」的口號和架構。經過這樣的「改造」，台灣型疑似的（或不完全的）政黨國家，等同於黨國體制誕生了。²¹

Johnson 在論及日本「發展型國家」類型時，非常強調從十九世紀日本面臨歐美勢力入侵時，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所形成的發展動力。然而，這樣的民族主義動力，以及特定歷史脈絡形

20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三版，新自然主義，2009 年，頁 165-166。

21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三版，新自然主義，2009 年，頁 91。

成的理論化，在後來「發展型國家」理論家的概念化中，逐漸模糊了，殊為可惜。²² 東亞各地近百多年的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殖民主義的侵略與摧殘，尤其上一代親身經歷過八年抗戰的中國菁英，屈辱感更是加強為救亡圖存的使命感。正是這落後感與屈辱感，強化顯現在統治階層堅強的發展意志上，²³ 故對於國共內戰、東西冷戰下產物：「救總」之研究，民族主義、國家安全、反共恐共危機意識，實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

參、「發展型國家」集中力量幹大事：「救總」之成立

一、黨國威權統治時期「救總」之角色定位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內戰由共產黨贏得勝利，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政權遷抵台灣。台灣成了國民政府的反共復興基地。國府命運本被認為已盡，但是因為韓戰爆發，美國介入台灣海峽，再對國府的軍事、經濟援助，致使人民解放軍的「解放台灣」受挫。美國支持國府的根本原因，在於台灣在亞洲冷戰中的戰略價值，而非無條地支持。因此，蔣介石必須向美國保證自己在台灣的「不可替代性」；立刻進行黨的「改造」，以黨員的重新登錄、淘汰來重編組織，並完成黨對行政機構與軍方的監視以及情治組織的重整，成功地重建政權。在其權力結構中，形成類似共產黨的疑似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國家（party-state），即黨國體制。²⁴ 黨國體制在台灣確立的過程，也正是蔣

22 徐進鈺，把民族找進發展型國家理論，台灣社會學季刊，第 107 期，2017 年，頁 206。

23 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緣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版，2017 年，頁 44。

24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三版，新自然主義，2009 年，頁 81-82。

介石、蔣經國父子之霸權在國民黨統御權威強化的過程。

一九五〇年代以降，國民黨在台灣的國家機器制度建構上，有以下的特色：（一）以黨領政的制度結構：即黨的決定就是國家的政策，而國民黨的組織運作上，其特色為「擬列寧式政黨」（semi-Leninist party），權力集中在中央，而在中央則由黨主席控制，因此具有相當強的人治色彩。（二）中央政府結構所代理的主權為「全中國」，而台灣被定義為地方政府。（三）威權統治的型態：不允許其他政黨成立。不過，除了國家機器的「壓倒性權力」（despotic power），國民黨仍透過其他的「下層結構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國家機器與社會團體建立關係，使其權力能滲透到各個角落，來維繫其統治。²⁵

於是「救總」就在蔣介石甫敗戰於毛澤東轉進來台，中國大陸沿海、邊疆尚有國共戰爭的動員戡亂時期、台灣正處戒嚴之禁止集會結社威權氛圍中，成為政府遷台後第一個重要的人民團體；²⁶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民 39），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台灣宣告復行視事，重新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一職。²⁷三月二十九日發表廣播文告：「……我們今日在自由區的同胞，一定要努力自強，積極準備反攻大陸，誓滅共匪，來救匪區裡水深火熱的同胞。即使在軍事上還沒有大舉反攻以前，也必要想盡種種方法，來保全大陸上飢餓同胞的生命。現在，我竭誠呼籲我們自由區的人民和海外同胞：……大家要節衣縮食，努力增產，……來救濟匪區奄奄一息的同胞。……。」到了四月四日，時任內政部政務次長、

25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一版，巨流，1996年，頁59。

26 劉維開，從救總檔案看1990年代前的大陸「災胞」救助工作，「中國的形塑」系列論文，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2012年，頁403。

27 救總實錄第一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80年，頁19。

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一組組長、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會政治組及經濟財政組委員的谷正綱，響應此一號召，遂成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²⁸

「救總」成立後，五〇年代初期政府每年補助五百萬元，之後隨著經濟發展，政府挹注金額亦逐年遞增，至六〇年代每年政府補助金從五千萬元以上上億元不等，七〇至七九年代每年或三億元補助，八〇年代始逐年下降至九一年，政府不再編列預算補助，僅餘專案補助。²⁹ 在這數十年來在台灣成立若干組織，主辦過許多大型救濟勸募活動，包括：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舉行「擴大勸募運動」大遊行³⁰、一九五四年舉辦「救濟大陸水災勸募活動」及「救濟越北難僑勸募運動」³¹、一九五五年舉行「救濟大陳來台義胞勸募運動」³²。這些大型集會遊行、勸募活動皆獲上至蔣總統伉儷、下至行政院院長及其所屬機關單位首長，與各地方政府首長等黨政軍要員悉數投入，除要喚起社會各界反共剿匪濟災胞憂患意識，亦有對公私領域各界領導幹部進行下達指令，督促干預、管理引導之積極作用。

除了大型勸募活動之外，行政院在一九五三年（民 42）號令，將日本歸還戰時被劫收的 1735 粒鑽石（重約 368.17 克拉）作為「救總」發行救災獎券標的物，獎券委由官方單位中央印製廠印刷、台灣銀行發行販售，共計收入 301 萬 8,367 元，專

28 谷正綱，救總實錄序，救總實錄第一、二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民 69，頁 1-2。

29 「財團法人中華救助總會（原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調查報告，2019 年，頁 27。

30 救總實錄第三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80 年，頁 365-367。

31 救濟年報第 5 年，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55 年，頁 11-12。

32 救濟年報第 5 年，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55 年，頁 12-13。

款專用置於「救總」的台銀專戶內。³³另為國人所關注的是，於一九九二年前，國人從事唱歌跳舞、看戲看電影等私人娛樂活動，都被強制性地隨娛樂稅加徵大陸救濟金，從一九五三年至九二年間，共計獲得 15 億 1957 萬 8435 元，這筆收入成為「救總」長期穩定的收入來源。只是在政府法定稅賦項目以娛樂不忘救災之說另立名目，且未經消費者同意即強制性稅斂，並在政府稅捐機關代收後直接交付給「救總」之相關做法，若非處於以黨領政、黨國一體遂行威權統治，僅一般人民團體，實難有此特權。

總的來說，處在戒嚴威權統時期，「救總」能享有合法社團地位，並獲黨政高層要員共襄盛舉³⁴，在境內外從事戰俘接濟、災胞安置、思想審查、策動擴大西藏革命運動，於金馬戰地前線空飄物資與宣傳品，並得以由財政機關代收轉付娛樂稅附勸大陸救濟金作為長期收入等種種排他性特權，國家干預指導，統合引導上下機關、各社團之痕跡確鑿。「救總」角色定位可謂是黨政一體，傾全國「集中力量幹大事」的產物，以落實兩蔣政權宣稱代表全中國、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等目的。

二、威權統治時期之「救總」任務特權

在威權統治時期白色恐怖氛圍中，「救總」的財政收支、工作內容皆披著解救大陸同胞免於水深火熱苦難中，策動境外抗暴團體以協力合作反攻大陸等反共復國大業、保衛國家安全之正當性外衣，復以主事者即當權統治者，因此，兩蔣所屬官僚們可擁

33 救濟年報第 5 年，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55 年，頁 13。中華救助總會，救總六十：中華救助總會 60 周年專輯，一版，2010 年，頁 20。

34 救總實錄第一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80 年，頁 21-23。

有充分的治理空間，使「救總」在黨國體制鞭策下，習以為常地被交付、委辦多項理所當然的特權任務，並定期接受管理考核。

據此，本節筆者據以「發展型國家」途徑特點：救亡圖存的發展意志、國家的自主性、鑲嵌自主的組織機關，及統合式管理、計畫及干預等四項指標，參酌《救總十年》、《救總實錄》、《谷正綱先生與救總》、《耕耘：救總五十四載工作紀實》、《救總六十：中華救助總會成立 60 周年專輯》，以及黨產會 2019 年之調查報告與聽證紀錄等文獻，檢證「救總」於威權時期人事安排、財務資產狀況，及業務範疇等運作模式。

（一）救亡圖存的發展意志：

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中國大陸建政，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取代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權。原已下野的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發表復行視事文告：「……一年以來共黨匪徒初則破壞和談，殘民贖武，繼則擅改國號，僭立政權，……。亞洲之情勢激變，世界之危機日益迫切。此誠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有之浩劫，凡我國人所當一致奮起救國自救之時也。……所望我海內外愛國同胞精誠團結，三軍將士砥礪奮發，各級官吏竭誠奉工，為恢復中華民國之領土主權，拯救淪陷同胞之生命自由，維護世界之和平安全，同心一德，奮鬥到底。務期掃除共匪，光復大陸，重建我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全國同胞幸共鑒之。」³⁵

35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譜長編 第九冊，一版，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頁 457。

甫敗戰流亡台灣的蔣介石前總統，或也認知到短期間軍事行動反攻大陸似無可能。然為標舉政權仍具代表全中國法統地位，遂以總統之尊於三月二十九日發表廣播文告，向中國大陸境內人民傳達關懷之情，同時也訓令台灣島內各界落實救災及救國之政策指導方針。內容提及：「目前大陸上空前飢饉的慘禍，已到了不能想像的程度。……。眼看我們大陸同胞活活餓死，毫不動心，真是喪盡天良，滅絕人性。……。中正想到大陸上億兆同胞，啼饑號寒，賣妻鬻子，流離失所的情形，更覺得不根除共匪，中國永無翻身的時候了。……。現在，我竭誠呼籲我們自由區的人民和海外同胞：要知道我們的生活和大陸匪區比較，真是天堂與地獄之別。大家應該要縮衣節食，努力增產，把剩餘糧食，用有效方法，來救濟匪區奄奄一息的同胞。並要主動寫千萬封的慰問信，空投匪區，告訴我們在這裏怎樣懷念他們，和設法救濟他們。」³⁶

文告發布後，隔日三月三十日全台各界不敢怠慢即刻動起來響應，包括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台灣省議員，各文教、婦女、金融、工、商、礦、漁、林等社團公司，上看四百三十餘人出錢出力具名參與，其中大多為剛播遷來台，亦不乏台灣本省籍名望人士，如：丘念台、李友邦、李萬居、吳三連、吳國楨、許丙、陳啟川、黃國書、黃朝琴、林頂立、林為恭、劉啟光等人。³⁷其中蔣宋美齡列發起人之一，指標性作用不在話下。

蔣介石政權及其百萬軍民追隨者撤退至台澎金馬，一方面仍眷戀著廣袤全中國江山版圖，也須面對北京當局解放台灣、血洗台灣企圖，引發的「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不安全憂患感，救

36 救總實錄第一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80年，頁20-21。

37 救總實錄第一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80年，頁21-23。

亡圖存成為唯一路徑。因此，「救總」不僅僅是人道救助機構，更肩負著與國際接軌、持續強化與中國法統的政治連結關係。對於東亞及許多前殖民地國家而言，民族的問題，包括民族的建構、歷史性的恥辱以及清理殖民歷史等，其實在在影響著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特殊性。故研究「救總」就必須把這機構單位放在復興中華民族，與冷戰格局中台海軍事衝突等地緣政治因素平台上作綜合性探討，就誠如擔任「救總」理事長數十年的黨政要員谷正綱所言：「在中國大陸尚未光復，共產匪黨尚未消滅，同胞苦難尚未解除之前，本會的任務便不能終止。」³⁸ 強調中共共產主義對原本民族文化的威脅，因而衍生民族主義也是戰後台灣「發展型國家」路徑的關鍵因素。³⁹

（二）反共復國任務的自主性：

台灣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起（民 34），即日本統治時期結束，至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六日（民 81），即金門、馬祖、東沙及南沙地區宣告解嚴前一日止，為期長達四十七年的威權統治時期。中國國民黨在這時期幾乎壟斷所有政治、社會、經濟資源，兩蔣領導施行黨政軍一把抓，復以二二八事件後遺症猶在、白色恐怖仍持續等高壓手段，以黨領政，黨說了算；「救總」肩負大陸救濟等同於反共復國神聖任務，其工作指導方針、內容自是具有優先性、排他性的自主性特權，可有效排斥私人利益與多元聲音，他者僅遵辦即可。

以此觀諸威權時期的「救總」領導幹部人事安排顯示，理事

38 救總實錄第二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印，1980年，頁293。

39 徐進鈺，把民族找進發展型國家理論，台灣社會學季刊，第107期，2017年，頁206。

長、常務理監事、理監事及其推選辦法，多是跟隨蔣介石流亡台灣，且原居住中國大陸的中國國民黨要員，大多由該黨中央委員或黨中央幹部擔任，例如：任「救總」理事長達四十年的谷正綱先生即歷任總裁辦公室第一組組長兼總裁辦公室研究設計委員會黨務組與經濟財政組委員等職務。接任谷正綱理事長職務者之梁永章先生，亦歷練過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臺灣省黨部主委、中央考紀會主委等職務。另歷屆常務理監事，也多由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或專門委員會擔任。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國民黨黨部與「救總」的人事重覆比率很高。⁴⁰

在財政收支方面，自一九五三年（民 42）起，經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 47、76 次工作會議、常務委員會第 113 次會議決議，「救總」得於電影院、戲院、歌舞廳、高爾夫球場等娛樂處所之票券，可隨票附勸大陸救濟金以做為長期穩定收入來源。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府亦將日本歸還暫時遭劫的 1735 顆鑽石（重 368.17 克拉），直接撥予當救災彩券之兌獎獎品，計收入 301 萬 8,367 元存入「救總」台灣銀行專戶。⁴¹ 至於辦公處所則由台灣省政府撥用提供。⁴²

「救總」這般人事、財政安排，既可上達天聽、聽令於黨，又能號令於下，可排除其他單位干預杯葛與問責，對上負責即是。黨國體制下的「救總」之自主性不言可喻。

40 「財團法人中華救助總會（原中國大陸災胞災救濟總會）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調查報告，一版，黨產會，2019 年，頁 8。

41 「財團法人中華救助總會（原中國大陸災胞災救濟總會）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調查報告，一版，黨產會，2019 年，頁 12-13。

42 「財團法人中華救助總會（原中國大陸災胞災救濟總會）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調查報告，一版，黨產會，2019 年，頁 14。

(三) 鑲嵌自主性的組織機關：

許多東亞研究發展的著作（參見 Amsden 1979,1985；Appelbaum and Henderson 1992；White 1988；Wade）指出發展型國家的自主性有兩面：免於社會利益的牽制，與國家有它的發展策略與看法並以制度帶動社會的發展。⁴³ 傳統國家自主性的看法，只指出了國家機器必須免於社會利益的影響，才能自主地建構發展策略。但是這個概念忽略了自主性並不表示一定有利於發展，也可能成為「掠奪性的國家機器」（predatory state）。因此，Peter Evans 提出了一個「鑲嵌的自主性」概念，係指「一個隱藏在具體社會連帶中的自主性，將國家機器與社會連結起來，提供制度性的管道來持續地協商和再協商標與政策」。⁴⁴

Evans 的鑲嵌性自主是指描述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概念。這種互動關係表明，國家機關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時，也必須與社會、市場有適當程度的連接；典型的「發展型國家」是一個觸角深入社會但又能保持其整體性的怪獸。⁴⁵「救總」在組織型態上為救濟事業機構，在任務性質上，係為協助政府辦理中國大陸災胞之救濟，故兼具政府機關與人民團體之雙重性質。

「救總」為執行中國國民黨交付的救濟救災、空頭空飄心戰品、策動游擊抗暴運動等工作，在蔣總統登高一呼下，除黨政軍要員動起來，不分省籍，民間各領域專項人才：文教、婦女、

43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一版，巨流，1996年，頁97。

44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一版，巨流，1996年，頁96-97。

45 Evans, Peter B.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金融、工商、農林漁礦等皆匯聚於此，為反共復國出錢出力、全力以赴。期間雖有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與蔣經國不合，惟係因源於蔣氏政工制度；另雷震、齊世英遭解除國民黨黨籍、會內職務，係因其批判時政，為兩蔣不喜所致，與「救總」工作無涉。「救總」可謂披著人道關懷、國際救援的慈善外衣，在黨國威權統治時期，較無爭議地串起黨政高層政治結構與民間治理基層的上下聯連結，係具有鑲嵌性又擁有自主權的組織機關。

（四）統合式管理、計畫及干預：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蔣介石前總統發表：「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具體地提出要決心革新、整肅、改變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紀律與作風，這一切從台灣做起，不只要保衛台灣，還要建設台灣成為三民主義的示範區。施行民生主義經濟措施，平均社會財富；對城市用地，應抑制土地投機，厲行照價徵稅與漲價歸公，實現市地地權平均。農民耕種土地可繼續耕種，保障其收益，並依耕者有其田原則，再予處理。確信三民主義的政治體制，貫徹為民主而奮鬥的決心。要團結海內外志士、愛國同胞，無分黨派、宗教、職業、性別，集中力量，堅持反共抗俄戰爭，消滅中共，完成中興復國任務。對於中共元凶首惡幹部絕不寬貸，至於一般共黨份子，許戴罪立功。最終期許中國國民黨達成合億萬人之心得為一心，集億萬人之力為一力，克服國家當前的危機，爭取反共抗俄勝利成功之終極目標。⁴⁶

也就是黨國體制、以黨領政的台灣，所號稱的「三民主義經濟」制度，由外到裡可以細細剝離為四層：（一）最外面披的是

46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常編 第九冊，一版，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頁 544-545。

「自由經濟」外套，容許市場運作與私人經濟活動，但政府往往隨心所欲、或明或暗地做選擇性的干預限制；（二）裡面穿的是「資本主義」內衣，與輸誠大的資本家與外國大財團曖昧勾結，對其他弱勢階級與基層團體則除非有所利用，否則少有理睬；（三）脫去衣物的裝扮，裡面長著「國家主義」的身軀，政府不只是對民間經濟活動管手管腳，本身更是經濟社會壓倒性構成份子，實質上大規模從事各類經濟活動，使政府預算與公營事業預算皆龐大臃腫，較諸社會主義國家亦不多讓；（四）最嚴重的是，台灣經濟體制在以上層層遮掩之下，包藏了一個「集體主義」一黨專政的禍心。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都在「黨國一體」的口號下，被不當地合理化。對這樣一個黨政權術與經濟利害相互糾纏的體制，姑且稱之為「黨國資本主義」，以描繪政黨凌駕國家、資本排擠民主的惡質寫照。⁴⁷

黨國體制對於其指導下之各式各樣社團給予社會團體的組織構造，並且滲透其中，獨佔社會團體組織資源及表達利益的管道。有論者指出，除了原級性團體的家族、本土宗教、少數本土化的外來宗教團體（如：一貫道、基督教長老教會）之外，幾乎所有具有現代性格的社會團體，都被安置於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滲透之下。⁴⁸ 被滲透的社會團體，絕不能積極向政治體系表達社會團體的集團性、或階級性的利害，也不能成為自發性的政治動員的基礎。團體的上層被滲透、拉攏，下層則被緊密地控制。黨國

47 陳師孟、林志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三版，澄社，1992年，頁24-25。

48 陳明通，威權政體下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一九四五 - 一九八六）—省參議員流動的分析，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頁135-136。

體制和社會相互作用的樣態，有很強的照顧庇護關係，即恃從主義的色彩。⁴⁹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六十三次會議。該次會議中報告、議決多項重要事項。這些重要事項包括國民黨中央第五組收到總統府王世杰秘書長轉達蔣中正總統指示，「救總」歷年帳目開支與工作及存款動用計畫，均應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出報告。國民黨中央第五組並在中常會上提出救總該項三年工作報告。自此「救總」得以人道救援、人權關懷的公益外衣包裝，實為滿足蔣介石反攻大陸、國民黨執著於大中國法統之真實政治目的。

肆、結論與展望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穩與政治參與是難以兼顧的問題。而東亞地區則選了政治穩定；這類穩定絕大多數是建立在軍人專制或以軍人為後盾的文官執政基礎之上，這種狀況為政府干預經濟社會提供了有力保障。這種高壓統治在經濟奠基時期，可以對保持社會穩定、整合國力、啟動發展形成必要的保障。但從長遠來看，如不即時調整會與社會經濟發展越來越不適應。⁵⁰

筆者以「發展型國家」途徑探究「救總」，獲致「國民黨係『救總』往昔的美麗與當下的哀愁」之研究發現，及「當今民主台灣是『救總』發揮所長最佳的舞台」之研究貢獻，分述如下：

49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三版，新自然主義，2009年，頁125。

50 張琢、馬福雲，發展社會學，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頁196-197。

一、國民黨係「救總」往昔的美麗與當下的哀愁

國民黨政府能夠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對外宣稱代表全中國，對內有效統治，而能夠維持自主的地位與三個因素有關：第一，社會內部沒有挑戰國民黨的力量，這與日據時代台灣本土勢力受到壓制、二二八事件中菁英的消失有關。第二，國民黨仍然控制著各社團、產業，且具有操控的地位。第三，美國的支持；在軍事、經濟與國際地位上支持中華民國，並透過美援穩定政局，強化了國民黨的地位。⁵¹

黨國體制下社會團體的控制，從法律來看，一九四二年在大陸制定，但在台灣仍然沒有修訂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法」中，第九條以下嚴格規定「人民團體」職員的選出方法、賦予主管機關極大的監督權限。這個法規由黨國體制的力量嚴密執行。例如：五六年春，實施「社會團體總檢查」，所有團體必須提出財政和活動內容的報告、成員名單、專職人員的經歷接受審查，拒絕接受審查的團體被禁止並沒收財產。而且，會運用黨組織對社會團體作以下相關處置：（一）社會戰略上重要社團，由黨國體制主導團體的組織，取得對此團體的領導權；（二）對已成立的團體，由黨組織加以滲透，掌握其主導權；（三）對想成立與黨敵對及競爭的團體，或脫離主導的團體，則搶先成立同性質的御用團體加以妨害。⁵²

據此印證「救總」過往脈絡軌跡，似乎多繫於、可歸因於國民黨決策；因國共內戰延續而成立，直屬國家最高領導人兩蔣總

51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一版，巨流，1996年，頁60-61。

52 若林正文，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三版，新自然主義，2009年，頁122-123。

統管制，有總裁、總統這座靠山，自是能承命於上、統籌於下，囊括眾多人才、資源，自主性地發揮工作職能，以不負威權時期政黨、國家政府所託之任務。

這樣的背景，時至今日「救總」尚難以「我們僅是一般人民團體」一語簡單帶過。畢竟在威權黨國時期，「救總」是少數需長年性、持續性地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出報告其歷年帳目開支與工作及存款動用計畫，議案得以列入國民黨中常會正式議程的人民團體，即便後期相關人民團體立案數量逐年遞增，「救總」相較於其他組織，筆者以「平等之上」(first among equals)形容「救總」往昔的特權業務、特殊關係地位，殊不為過。

「救總」往昔的美麗因兩蔣黨國體制而立而興，今日當下的哀愁亦因國民黨臍帶關係蒙上一層陰影；毋須否定該單位長此以往的災難救助、濟弱扶平功績，惟也無法因公益外衣，迴避忽略威權時期國民黨實質控制「救總」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運作，以及在民主化進程裡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等之社會疑慮。概括承受、誠實面對一切檢驗，方能重建「救總」新時代公益健康社團之陽光形象。

二、民主台灣是未來「救總」發揮所長最佳的舞台

歐威爾 (G.Orwell) 在其名著《Nineteen Eighty-Four》中的一句名言：「老大哥無所不在，但你卻毫無所覺。」所謂的老大哥，就是極力發展極權的政府；在台灣，老大哥就是畸形體制下集黨、政、軍、經大權於一身的政黨與政府，⁵³ 今日老大哥

53 陳師孟、林志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三版，澄社，1992 年，頁 22-23。

陰影雖漸從我們四周褪去，但多數的人卻不自知，或即使自知，也習以為常，故對於黨國體制往日總總之相關檢討、辯證，或認為不關己事，或基於亦曾參與、受庇應其中，選擇避重就輕、避而不答。

「救總」過往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是否為國民黨實質控制？運作迄今是否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等相關爭點，黨產會業已於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完成調查報告，並在同年八月三十日邀集當事人代表，及利害關係人國民黨，和學者專家、證人及內政部代表等各界舉行聽證會。後續相關程序尚有很長一條路要走。

研究者須持平地、綜合性地衡酌「救總」既是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自然會受到彼時思想著落的時代環境背景，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影響或制約，反應著建構者賦予「救總」特定的歷史處境或社會位置。研究目的不在於也無法影響，接續的行政處分或訴訟作為，貢獻應在於爬梳文獻，佐以立論依據，期能釐清歷史真相，期能劃出一條可供參的未來路徑。

威權時期的「救總」成員非富即貴，是黨政軍要員向心力的光榮集聚地。進入民主化的現代台灣，誠如今年九月四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說所提：「台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America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Taiwan's embrace of democracy shows a better path for all the Chinese people.）。民主台灣是「救總」可在東亞地區、華人世界，憑藉其長期累積的人道救援、人權關懷經驗，發揮濟

弱扶平專長的最好的後盾，最大的舞台。支援接濟香港抗暴運動之人道救援，或可作為「救總」籌思新世紀再出發的光榮起點！

是故，展望「救總」的未來，關鍵在於需先積極地釐清，自己是否為政黨附隨組織？持續性地自律清查勾稽財產來源是否不當取得，規劃如何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取之於國家、返還回國庫。剔除過多的情緒性、意識形態表述，坦然面對歷史真相，將有益於從威權刻版印象中脫困，成為華人世界、東亞地區中從事國際人道救援、關注人權議題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專書

1.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圖書。
2. 易君博，2003，《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
3. 若林正文，2009，《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
4.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1992，《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臺北：澄社。
5. 張琢、馬福雲，2010，《發展社會學》，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頁 196-197。

6. 蔡東杰，2013，《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臺北：五南圖書。
7. 瞿宛文，201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崛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
8. 龐建國，2012，《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時代意義》，臺北：韋伯文化。

（二）專書論文

9. 劉維開，2012。〈從救總檔案看 1990 年以前的大陸「災胞」救助工作〉，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編，《「中國的型塑」系列論文》。臺北：政治大學。頁 403。

（三）期刊論文

10. 王振寰，2003，〈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與轉型〉，《臺灣社會學刊》，第 31 期，頁 16。
11. 林文斌，2008，〈臺灣「發展型國家」國家的調適或轉型？〉，《政治科學叢論》，第 37 期，頁 100。
12. 徐進鈺，2017，〈把民族找進發展型國家理論〉，《台灣社會學季刊》，第 107 期，頁 206。
13. 趙自勇，2005，〈發展型國家理論研究的進展和反思〉，《當代亞太》，第 11 期，頁 6。
14. 鄭為元，1999，〈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頁 4-5、9-10、12-13。

（四）學位論文

15. 陳明通，1990。《威權政體下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一九四五—一九八六）—省參議員流動的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五）官方文件

16. 中華救助總會，2010 年。《救總六十：中華救助總會 60 周年專輯》，頁 20。
17.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80。〈救總實錄序〉、〈救總實錄第一篇〉，《救總實錄》，頁 1-2、19、20-21、21-23。
18.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80。〈救總實錄第一篇〉，《救總實錄》，頁 19、20-21、21-23。
19.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80。〈救總實錄第二篇〉，《救總實錄》，頁 293。
20.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80。〈救總實錄第三篇〉，《救總實錄》，頁 365-367。
21.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980。《救濟年報第 5 年》，頁 11-12、12-13、13。
22. 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第九冊》，頁 457、544-545。

（六）網際網路

23. 不當黨產委員會編，《社團法人中華救助總會（原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調查報告》（臺北：不當黨產委員會，2019 年），頁 27。
24.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cipas-production/news/20>

19/08/6c045a117581976c7151087929854d5a.pdf) 。

二、英文部分

25. Alice H. Amsden.,1989.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 Evans,Peter B.,1995.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7. Frederic C Deyo.,1987.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8. Johnson, Chalmers A.,1982.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9. Wade, Robert H., 1990.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s Industrialization.
30. Weiss,Linda.,1998.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1. World Bank.,1993.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 V.Chibber,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7:4(2002),pp951-989.